臺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0年6月　頁325～358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輔廣《詩童子問》新論

黃　忠　慎*

提　　要

在《詩經》學史上，朱熹的《詩集傳》被認爲是繼《毛詩傳箋》、《毛詩正義》之後的第三個《詩經》研究之里程碑，除了此書之外，朱熹另有《詩序辨說》與《詩傳綱領》之作，這些都是研究朱熹《詩經》學的重要文本。輔廣原是呂祖謙的學生，其後改投朱熹門下，撰作《詩童子問》一書，對《詩序》有很激烈的批評。以往的研《詩》學者多把《詩童子問》視爲「擁朱」、「述朱」學派中的一部著作，未能深入理解輔廣的用心。本文分析輔廣的解詩方式與特質，說明《詩童子問》在《詩經》學史上的意義，以爲輔廣的《詩童子問》、《詩童子問・小序》與《詩童子問・詩傳綱領》之寫作意旨與朱熹《詩經》學的三本著作相當，其依循朱熹《詩經》學體系撰作的意圖極爲明顯。《詩童子問》多處引述朱熹三本《詩經》學著作，因此其書可視爲朱熹《詩經》學體系建構完畢之後的補充著作。輔廣以具體成果來宣揚、強化朱熹《詩經》學的方法論，《詩童子問》之重要性絕非後來所謂「羽翼朱學」的作品所可比擬。

關鍵詞：朱熹、《詩集傳》、《詩序辨說》、輔廣、《詩童子問》

本文於99.01.25收稿，99.05.12審查通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New Look at Fu Guang's *Shi Tong Zi Wen*

Huang Chung – Shen*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ive tradition of the *Shi Jing* [Book of Songs or Classic of Poetry], Zhu Xi's *Shi Ji Zhuan* is considered a third great milestone, building on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classic *Mao Shi Zhuan-Jian*, and the *Mao Shi Zheng Yi*. Aside from the *Shi Ji Zhuan*, Zhu Xi wrote *Shi Xu Bian Shuo*, and *Shi Zhuan Gang Ling*, all vital works for researching 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i Jing*. Fu Guang was Lü Zu-Qian's former student, and later became a student of Zhu Xi. Fu Guang wrote *Shi Tong Zi Wen*, strongly criticizing the *Shi Xu* [Great Preface to the Songs]. Many scholars of past generations have considered *Shi Tong Zi Wen* to belong to or continue the "School of Zhu Xi," but viewing it simply as such misses Fu Guang's own purposeful striving and accomplish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thod and character of Fu Guang'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i Jing*, and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Shi Tong Zi Wen* in the of *Shi Jing* interpretive tradition. The main content of *Shi Tong Zi Wen*, as well as the "Xiao Xu" and the "Shi Zhuan Gang Ling" sections correspond largely to Zhu Xi' three works; it is extremely clear that Fu Guang is intent on following Zhu Xi's system of *Shi Jing* stud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d Fu Guang quotes Zhu Xi's three works extensively. Thus, Fu Guang's work can be seen as a supplement to Zhu Xi's. However, Fu Guang's promotes and improves on the methodology used in Zhu Xi's work on the *Shi Jing*, with important and tangible accomplishments. The value of *Shi Tong Zi Wen* clearly transcends the label of works viewed simply as "auxiliary aids to Zhu Xi's scholarship."

Keywords: Zhu Xi, *Shi Ji Chuan*, *Shi Xu Bian Shui*, Fu Guang, *Shi Tong Zi We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輔廣《詩童子問》新論

黃　忠　慎

一、前　　言

宋儒輔廣（寧宗嘉定年間〔1208-1214〕尚在）於清代光緒六年(1880)奉入孔廟，列爲「西廡先儒」從祀，對一個儒者來說，這是無上的殊榮。但是，如此備享尊榮的人物，其生平事蹟卻留載不多。根據《宋元學案》記載，輔廣以父蔭任官，後四試不第，遂從呂祖謙(1137-1181)遊，其後又問學於朱熹(1130 -1200)，留三月而後返。晚年上書言事，爲當道不喜，遂歸鄉築傳貽書院教授弟子，學者稱爲傳貽先生。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卒，贈朝奉郎。[1]

---

[1] 輔廣生平詳清・黃宗羲（1610-1695）原著，全祖望（1705-1755）補修：《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 1986 年 12 月），第 3 册，卷 64 ，〈潛庵學案〉，頁 2053-2054 。案：輔廣與黃榦常被相提並論，如元儒袁桷（1266-1327）〈輔漢卿先生語孟諸序〉合稱兩人爲黃輔二先生，並云：「合黃輔以傳，則文公授受之旨益得以遠……。」見袁桷：《清容居士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5 年），第 75 册，卷 21 ，頁 326-327 。又明儒劉定之(1409-1469)〈議劉靜修薛文清從祀〉亦有「……論其於道所得，以與朱子諸徒相比，並若黃直卿、輔廣之親承微言」之語。見明・程敏政（1445-1499）編：《皇明文衡》，《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108 册，卷 8 ，頁 105 。另據桐鄉新聞網所收〈輔廣〉一文，輔廣學術思想獨到，從不隨俗附和，只與同門黃榦交厚，但在學術研究上，兩人思想各異，黃主張「性有善惡」，輔主張「性無善惡」，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詩經》學史上，輔廣的《詩童子問》是很有象徵意義的書籍。就師承來說，輔廣爲朱熹親授業弟子，頗受其看重，[2]亦以此聞名當世。[3]朱熹《詩集傳》爲《詩經》學史上之典範巨作，[4]而其弟子輔廣的《詩經》學專門著作《詩童子問》向來被視爲「羽翼師說」的作品。或此之故，歷來對《詩童子問》的「意義」問題沒有太多探究，連其如何「羽翼」朱學，論者亦少。現今除了《詩經》學史或是《詩經》專著解題性質的書籍還約略提到《詩童子問》，深入研究的學術著作數量之欠缺令人訝異。所幸數年前終於有研究者以〈輔廣《詩童子問》初探〉之文，分析《詩童子問》的解經內容與特點，才初步彌補這個空白。但是該文對某些重要課題與《詩童子問》在《詩經》學史上的定位，未能深入論述。[5]故本文以不同的視域，探討《詩童子問》的書寫宗旨，進而評價本書，並說明其在《詩經》學史上的存在意義。

相發明，時人稱之爲「黃輔」。詳 http://txnews.zjol.com.cn/txnews/system/2006/09/01/000001649.shtml 。

2 朱熹：「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 2 月），第 6 册，卷 59，頁 2894，〈答輔漢卿一〉。

3 《宋史》：「董槐，字庭植，……學于永嘉葉師雍。聞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廣歎其善學。」《宋史》，《正史全文標校讀本》（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10 月），第 4 册，卷 414，頁 3337。

4 「典範」（paradigm）是美國的湯瑪斯・孔恩（Thomas S. Kuhn,1922-1996）說明科學發展的重要創見，雖然孔恩本人對於這個詞語所下的界定尚不夠明確，但至少提出了典範所具備的特徵或條件：作者的成就實屬空前，且其著作中留有許多問題能讓有志一同的後起者來共同解決。詳〔美〕孔恩著，程樹德、傅大爲、王道還、錢永祥譯：《革命科學的結構》（臺北：遠流出版社，2004 年 8 月），頁 53-54。此處借用其概念，表示朱熹《詩集傳》擁有巨大的成就，但也留下許多問題讓後人來共同解決。

5 詳陳明義：〈輔廣《詩童子問》初探〉，《修平人文社會學報》第 7 期（2006 年 9 月），頁 55-104。案：此文長達五萬言，取證詳細。依該文的論述，輔廣對於朱熹的意見是接受又創新，因此該文於結論稱許輔廣「在闡揚朱說、奠立朱熹《詩》新學傳統上的先驅角色」。此文爲研究輔廣《詩童子問》之重要資料，然某些關鍵問題未及詳論，而且對《詩童子問》在《詩經》學史之定位與價值論述較爲欠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詩童子問》的體例設計與解《詩》特質

《詩童子問》共十卷，以闡發《詩經》意旨爲主，關於字詞訓詁則省略不談，引述的論證多是宋代學者的言論，很少歷史引證，這點與《詩集傳》中的釋例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詩童子問》在卷一之前另有〈詩傳綱領〉、〈小序〉、〈師友粹言〉三個單元，輔廣稱之爲「卷首」，此卷可視爲輔廣的解《詩》觀點說明。卷首之後的卷一是〈國風一・周南一之一〉、〈召南一之二〉、〈邶一之三〉，卷二是〈鄘一之四〉、〈衛一之五〉、〈王一之六〉、〈鄭一之七〉、〈齊一之八〉、〈魏一之九〉，卷三是〈唐一之十〉、〈秦一之十一〉、〈陳一之十二〉、〈檜一之十三〉、〈曹一之十四〉、〈豳一之十五〉，卷四是〈小雅二・鹿鳴之什二之一〉、〈白華之什二之二〉、〈彤弓之什二之三〉、〈祈父之什二之四〉，卷五是〈小旻之什二之五〉、〈北山之什二之六〉、〈桑扈之什二之七〉、〈都人士之什二之八〉，卷六是〈大雅三・文王之什三之一〉、〈生民之什三之二〉，卷七是〈蕩之什三之三〉，卷八是〈頌四・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魯頌四之四〉、〈商頌四之五〉，卷末是〈協韻考異〉。[6]

漢代以來，今古文《詩》讀本皆將〈小雅〉七十四篇，分隸於七個「什」中，分別是：〈鹿鳴之什〉、〈南有嘉魚之什〉、〈鴻鴈之什〉、〈節南山之什〉、〈谷風之什〉、〈甫田之什〉與〈魚藻之什〉，到了宋代，朱熹《詩集傳》的分什則是：〈鹿鳴之什〉、〈白華之什〉、〈彤弓之什〉、〈祈父之什〉、〈小旻之什〉、〈北山之什〉、〈桑扈之什〉與〈都人士之什〉。[7]輔

[6] 《四庫全書》本遺漏〈曹一之十四〉數字，茲依體例補。

[7] 案：北宋蘇轍撰《詩集傳》，將〈小雅〉分爲〈鹿鳴之什〉、〈南陔之什〉、〈彤弓之什〉、〈祈父之什〉、〈小旻之什〉、〈北山之什〉、〈桑扈之什〉與〈都人士之什〉朱熹的分什參考了蘇轍之作，但略加調整，在其名目中，有〈白華之什〉，而無〈南陔之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廣並未說明何以朱熹的分什方式優於漢儒，僅在「白華之什二之二」下輕描淡寫地說：「〈雅〉、〈頌〉以十篇爲什，亦未知果誰所定也？」當然，身爲朱子高徒，輔廣在〈小雅〉的分什部分依從《集傳》，並未交代理由，亦爲人情之常。

進入實質的詮釋程序時，《詩童子問》不錄詩文，僅在各詩篇下分章論詩之作法與章旨大意，有時則以「章句」作總結。例如〈鄘風・柏舟〉共二章，輔廣云：「一章。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母也天只，愛而尊之之辭。不諒人只，何其不諒我之心也。常人之情，人不己知，而至於自辨說，則必有不平之氣，忿厲之辭，而共姜之言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其意愈切，其辭愈緩，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矣。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二章。靡他，言其不敢有他而已。靡慝，則又言其不屑於爲惡也。」「章句。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國也。」[8] 這是結構完整的例子。不過，更多的情況是，《詩童子問》並未逐章解釋，以〈周南・卷耳〉爲例，輔廣在一章下云：「〈葛覃〉、〈卷耳〉二詩皆是賦體，但〈葛覃〉則直敘其事，〈卷耳〉則是託言而已。或謂卷耳可作麴蘗，而酒醴又婦人之職，故后妃託言采之，而下二章因言酌酒以自解，其說似亦可取，不然則后妃何爲而采此邪？但先儒拘於《序》說，則非是，故先生正之，斷以爲文王，則一詩之義自明。又謂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傍，更不消添字說得，而后妃貞靜專一之意，皆可見於言外矣。」二章下云：「姑，且也。維以，欲其也。曰且，曰欲其，亦可見其託言之意。」接著跳過第三章，連「三章」字眼亦闕如，而於四章下云：「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

[8] 《詩童子問》，《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經部，第 68 册，卷 2 ，頁 324 ： 1a-b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亦甚之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憂之極，惟有愁歎而已，非酒可得而解也。」最後再以「章句」作結：「詩之義既明白如此，故疑其當文王朝天子，會諸侯，征伐須密、崇國之時，及羑里拘囚之日而作，然無所考，亦不敢決也。先生又嘗答學者問，因曰，此詩後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又張平子〈四愁詩〉云：『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亦暗合此意耳。」[9] 這是《詩童子問》解詩選擇幾章加以論述，最後仍以「章句」總結的例子。

詩文訓釋並非輔廣解《詩》之重心，因此，《詩童子問》對於每章都進行解釋者較少，輔廣面對詩篇，通常僅針對其中二、三章進行論述，甚至也有僅列一章者，如解〈召南・殷其雷〉云：「一章。此詩明白，只涵詠便自見，念其勞，美其德，冀其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情性之正矣。婦人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10] 所有解釋如上，不解二、三章，亦無「章句」。若謂不解全篇各章之意，是因換韻重唱之章不需解釋，則又不然，例如〈鄘風・牆有茨〉、〈衛風・考槃〉、〈王風・兔爰〉……三章歌詠一事，輔廣亦章章作解。〈王風・采葛〉三章歌詠一事，輔廣僅跳過第二章，第三章仍加以解釋。〈鄭風〉之〈蘀兮〉、〈狡童〉都僅二章，且章法句式全同，輔廣亦二章分別作解，顯然《詩童子問》在體例的設計上略嫌隨興。

綜觀全書，《詩童子問》於最末立「章句」之形式來解說詩意的共九十三篇，不到全書的三分之一。[11] 檢視「章句」之內容，主要是用以解疑、申述、

[9] 同前註，卷 1 ，頁 311 ： 6a-b 。

[10] 《詩童子問》，卷 1 ，頁 315 ： 15a 。案：涵詠一詞，在《詩童子問》中也常作涵泳、諷詠。

[11] 〈國風〉中立有「章句」之體式者共計 93 篇，分別是：〈周南〉 5 篇，〈召南〉 4 篇，〈邶風〉 11 篇，〈鄘風〉 8 篇，〈衛風〉 5 篇，〈王風〉 4 篇，〈鄭風〉 3 篇，〈齊風〉 2 篇，〈魏風〉 2 篇，〈唐風〉 2 篇，〈秦風〉 3 篇，〈檜風〉 1 篇，〈豳風〉 3 篇。〈小雅〉則有 20 篇，〈大雅〉 14 篇，〈周頌〉有 6 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點評、說教，[12] 而非針對生難字詞、名物制度進行詮說，由此可知輔廣說《詩》的重點取向。

三、輔廣的解《詩》態度與方法

輔廣《詩童子問》對《詩序》有很多批評，這是直承朱熹而來的學術觀點。但是，在用語上較朱熹更爲直接而激烈，立場相當鮮明。[13] 輔廣以爲《詩序》的說法讓後來學者在詮釋的過程中受其影響、牽絆，而得出錯誤的解釋。[14] 又

---

[12] 例如解〈君子偕老〉：「章句。凡人之責人，辭愈多，則氣愈暴；氣愈暴，則辭愈厲。此則志不帥氣，而氣反動其志者也。君子之責人，則辭愈多，而氣愈緩；氣愈緩，而辭愈和，此則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且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如此詩之詞益婉，而意益深，則心不至於失其正矣。東萊先生責之問之惜之三字，說盡詩意，極好玩味。」解〈唐風・羔裘〉：「先生但以居居究究四字不可曉，故以爲未有在位不恤其民之意。又曰：『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此正得闕疑之意，然曰羔裘豹袪，則是指其卿大夫也明矣。『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則其欲去而不忍之意，亦可見矣。近世諸儒皆據《爾雅》有『居居、究究，惡也』之訓，故多從毛鄭之說，然先生嘗謂《爾雅》乃是集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者，如此則居居、究究之訓，亦未可據也。」解〈小雅・常棣〉：「自死喪而急難，自急難而小忿，所謂言之雖若益輕以約也，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則自厚而至於薄，雖薄而猶有不能自已者焉，則所謂益深且切矣。此詩旨義至晦菴與東萊二先生而始明。考究推說，殆無餘蘊矣。至於意味之淵永，則又在夫學者熟玩而自得之。」以上分見《詩童子問》，卷 2 ，頁 324 ： 2b 。卷 4 ，頁 351 ： 5b 。

[13] 清・周中孚（1768-1831）：「潛庵受學於朱子，故專主闡發師說，其攻擊〈小序〉，較朱子更甚，所謂變本加厲也。」《鄭堂讀書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8 年 8 月），卷 8 ，頁 135 。《四庫提要》亦直指《詩童子問》「其說多掊擊《詩序》，頗爲過當。」《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4 年 10 月），第 1 册，卷 15 ，頁 343 ： 28b 。

[14] 輔廣論〈衛風・考槃〉：「鄭氏牽於《序》而有害於義。程子雖易其訓詁，而得忠厚和平之意，然亦以牽於《序》而未盡其旨。《序》之爲《詩》害也大矣！」同註 8 ，卷首，頁 283 ： 23b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批評《詩序》妄自創說，支離荒謬。[15] 即使承認《詩序》所言精微，輔廣也認爲這樣反而迷惑後人愈深，導致無法獲取詩之旨意。[16]

《詩童子問》解釋詩旨時，經常引述蘇轍 (1039-1112) 之說，全書多達十九處，讓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大概有兩處，其一，解〈周南・漢廣〉謂「先生辨蘇氏之說，於此其失明矣」；[17] 其二，輔廣在解〈大雅・蕩〉時感嘆，《詩序》之謬誤明顯可見，歷代學者卻始終未能予以反駁，直到蘇轍才釐清了詩旨，可見《詩序》危害《詩》學的嚴重性。[18] 輔廣稱許蘇轍的反《序》，不過，蘇轍反對的僅是《詩序》首句下的申說之語（以下簡稱「後序」），對於篇題下一語（以下簡稱「首序」）依然是極爲尊重的，[19] 輔廣則無此意，就以〈關雎〉爲例，《序》以「后妃之德」釋之，輔廣云：「《序》以〈關雎〉之詩爲述后妃之德，固未有害，而不知推后妃之德，以本於文王，則亦未能盡此詩之義，況乎以化行國中，三分天下，而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大害乎理。」又如《詩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輔廣云：「據首章說化行俗美，室家和平，則是文王之化行，而天下之俗美，故致夫婦和平之效，如此則此〈序〉首句專以爲后妃之美者，亦恐非是。」[20] 又如《詩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

[15] 輔廣論〈邶風・靜女〉：「毛、鄭既爲『靜女』二字所惑，又不知彤管爲何物，遂創爲古者后妃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出無所據，且並引銀環金環之事爲說，可謂支離。其爲繆妄本不難見。而後人拘於《序》說，卒不敢以爲非，則《序》之爲《詩》害也大矣。」同註 8，卷 1，頁 322 ： 29b-323 ： 30a 。

[16] 輔廣論〈鄭風・狡童〉之《序》：「其論愈精，其害愈甚，所謂害者，非止此之所言，備見〈有女同車・序〉下說。」同註 8，卷首，頁 286 ： 28a 。

[17] 同註 8，卷首，頁 279 ： 15a 。

[18] 輔廣論〈大雅・抑〉：「此《序》之謬，明白易見，而先儒皆莫之辨，直至蘇氏始能明之，《序》之爲《詩》害也大矣。」同註 8，卷首，頁 296 ： 49a 。

[19] 《四庫提要》：「蘇氏《詩集傳》二十卷，宋蘇轍撰。其說以《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爲毛公之學，衛宏之所集錄，因惟存其發端一言，而以下餘文悉從刪汰。」同註 13，第 1 册，卷 15，頁 336 ： 13a 。

[20] 同註 8，卷首，頁 279 ： 15a 。案：「化行俗美，室家和平」爲朱子《詩集傳》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輔廣云：「首句非是，此但賢者不得志於衰世，玩世不恭，而思古盛王之辭，未見其有所刺也。末句亦不能盡此詩之意。」[21] 不過，輔廣對於「後序」的不滿的確多於「首序」，但這是有理可說的，他在評〈椓木・序〉「〈椓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時說：「有忌妒之心，則必無逮下之意。大率〈小序〉辭簡者多得詩意，繁者或反失之，蓋會意與穿鑿之不同故也。」[22]「後序」文字與內容多於「首序」，容易出現的瑕疵自然也隨之增多，在輔廣看來，並無「首序」較爲可信之事。

基本上，除了細節不盡相同，輔廣對於朱熹的《詩經》學的確有篤信追隨的現象，就以前舉〈芣苢〉爲例，輔廣云：「先生無說者，豈以上兩篇例自可見，而後篇《序》下又有可以正前篇之誤之說，故於此有不必言之者歟？」[23] 朱熹未曾說到的，不代表輔廣就不能說，但輔廣依然要爲朱熹的「無說」作解釋，則其尊師心態亦可由此窺知了。

假若《詩童子問》的內容都在輔翼朱說，則本書的價值不容高估，但實情又非如此，輔廣對《詩經》詮釋的方法論問題的探討，才是本書的核心論題，也正因有方法論的探討，此書價值才不宜低估。

筆者以爲，在《詩童子問》卷首部分，其實展現了輔廣在建構方法論上的企圖。《詩童子問》先後列了「詩傳綱領」、「小序」、「師友粹言」等三大單元，其中，「詩傳綱領」尤爲特殊。朱熹本有《詩傳綱領》之作，[24] 主要是徵引〈詩大序〉、先秦典籍與前輩學者對《詩經》詮釋的重要觀點，然後再申之以自己的意見。輔廣《詩童子問》卷首「詩傳綱領」所徵引的典籍記載與前人言論，與朱熹《詩傳綱領》相同，但是後標小字爲輔廣對這些言論的意見，

[21] 同註 8 ，卷首，頁 282 ： 20b 。

[22] 同註 8 ，卷首，頁 279 ： 14a 。

[23] 同註 8 ，卷首，頁 279 ： 15a 。

[24] 《詩傳綱領》的完成時間迄未定論，根據朱傑人的初步推定，《詩傳綱領》應該是朱子晚年所著，其成書時間當晚於《詩集傳》。詳朱傑人：〈朱子詩傳綱領研究〉，鍾彩鈞主編：《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 2002 年 6 月），頁 40-41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中並無朱熹《詩傳綱領》中之論述。當然，輔廣在其中對朱熹之意見頗多引述，並且大加推崇。

「小序」部分則羅列各篇〈小序〉，然後以小字表示他對各篇說法的意見。這種作法與朱熹《詩序辨說》的體例相近。輔廣在這部份堅守朱熹的說法，反對《詩序》的意見，立場鮮明。

「師友粹言」選錄朱熹論《詩》的言論，其中包括了「讀《詩》法」、「論韻」、「〈雅〉論」、「論〈大序〉」、「論〈小序〉」、「論六義」等幾個小項。其中有幾條於今日之《朱子語類》中可見。「師友粹言」不僅記載跟隨朱熹時所記下的師說，輔廣還把古人與時人論《詩》的意見記錄在卷首，表達了他對《詩經》學重要問題的基本觀點。

整體而言，《詩童子問》卷首部分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反覆強調讀《詩》法對理解《詩經》的關鍵性。如在「師友粹言」中首列「讀詩法」，全是強調「涵泳」、「玩味」對解讀三百篇的重要性。輔廣還引述朱熹的意見，以爲熟讀玩味《詩經》之後，才能通訓詁之理，也才能進一步感發興義，體會其中大道。[25]

輔廣對傳統的章句訓詁的態度，大致上以爲學者不該拘泥於其中。依其說，《詩經》意義的獲取，不能僅停留在文字意義的斟酌上，而必須反覆吟哦玩味，才能得到超脫文字表面的眞義。[26] 換言之，輔廣以爲傳統的訓詁詮解無

[25] 《詩童子問》：「《詩》且逐篇旋讀方能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味之耳。若疑〈鄭〉、〈衛〉之不可爲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覆玩味，不費工夫也。」〈師友粹言〉，同註 8，卷首，頁 299：55b。

[26] 輔廣：「後世學詩者泥於章句，汩於訓詁，雖老師宿儒往往墮於穿鑿固滯之域，而終不足以知詩之義，怎生責得學者？又何望其興起乎？」「今人學詩所以無感動興起處，只爲不曾諷詠，卻只泥章句故也。惟明道先生不泥章句，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故便能使人有得處。」又說朱熹解釋〈周南・關雎〉之言：「字字句句皆有著落，不泥於章句訓詁而深得夫詩人之意，可謂善說詩矣。後之學詩者皆所不能及也。」以上分見《詩童子問》，卷首，頁 276：9b；277：11b；卷 1，頁 310：5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深入詩文的內在意旨。唯有涵泳、玩味才是最好的讀詩法，以此一方法讀詩，還可以順便會通訓詁。[27]

要求讀者以「涵詠」、「玩味」方式閱讀《詩經》的觀點，在《詩童子問》中可以找到近八十處，[28] 可見輔廣對這種閱讀法的重視與強調。程頤曾經提出「浹洽」之觀點，以爲閱讀經典時要將整個生命精神都浸染在其中，使人完全與經典中的道理相融爲一體，如久浸於水中一般，完全濕透。朱熹對「浹洽」之法頗爲認同，以爲必須對聖賢語言進行深度思考與理解，方能有所得。[29] 朱熹也認爲閱讀《詩經》最好的方式是涵泳、玩味。朱熹所講的這一段話，輔廣極爲欣賞，在《詩童子問》中就出現了三處，其中之一爲：

> 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必須得著意去裏面訓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詠者久之，詩可以興。須是反覆熟讀，使書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30]

此處「必須」應爲「不須」之筆誤，從今存《朱熹語類》及輔廣後二處引用的

---

[27] 案：吟哦玩味之讀詩法的強調，使得輔廣接受了朱熹的叶韻說，不過他在「師友粹言」〈論韻〉有這樣的記載：「問：詩叶韻有何據而言？曰：叶韻乃吳才老所作，某又續添減之，蓋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吳才老補音補韻，其說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或問：吳氏協韻何所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不盡。」同註 8 ，卷首，頁 302 ： 61b-303 ： 62a 。或許輔廣對於叶韻說仍存有疑義，故把〈協韻考異〉放在卷末，表示對於朱熹《詩經》學的全面觀照。

[28] 根據筆者的初步統計，在《詩童子問》中論及讀《詩》方法的類型大約可分爲五種：涵詠（或稱涵泳、諷詠）、玩味、推本、興起、章句訓詁。其中尤以第一、二種類型陳述的最多最繁，分別有 21 處、 69 處，扣除其中涵泳與玩味重複出現在同一處的有 12 個，則總計有 78 處之多。

[29] 朱熹：「浹洽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極有深意。」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臺北：華世出版社， 1987 年 1 月），第 2 冊，卷 20 ，頁 448 。

[30] 同註 8 ，卷首，頁 299 ： 55a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字相較可知。[31] 朱熹將詩意分成表面的文義與深層的意義兩層，依其意見，讀詩要先曉得詩文大意，接著還要不斷地涵泳諷味，反覆熟讀，然後才能進入第二層詩意，使詩意與我心相融相乳，使我心感動興發。

輔廣將讀《詩》的最終目的指向修身，將知識延伸到價值、美德等倫理道德上面。甚至認爲某些解釋雖然不符合詩旨大意，爲了對讀者有益，也應該時常涵泳玩味。[32] 筆者以爲，朱熹的涵泳玩味說到了輔廣手中，有了進一步的申論。特別是，輔廣意識到了理解者與文本之間位於同一處境，他突出了讀者在詮釋過程中的能動性，且賦予詮釋者相當程度的闡釋權力。爲了讓涵泳的工夫具體化，輔廣用涵泳、玩味來解說詩詞時，往往和興起、感動等相連[33] 如說：

> 詩雖本於人情，其言易曉，然全在諷詠，必諷詠之然後詩與己意優柔浸漬，相與乳入，故曰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若誦而習焉，不能使其志意悠然興起於善，則不善讀詩者也，雖多亦奚以爲！[34]

輔廣在這裏沿用水的意象來說明理解的過程：先將己意優柔而緩慢地浸泡在詩文中，借著涵泳的工夫漸漸與詩意相融，使詩意進到讀者心中，進而感動興起善念。所以輔廣又引了朱熹另外的話語，表達他對「詩意有深淺兩層」的認同：「讀詩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個皮殼子了，又須識得它裏面體骨髓方

---

[31] 本段文字出自《朱子語類》，原文爲：「『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不須得著意去裏面訓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吟詠者久之。」卷 80 ，第 6 册，頁 2087 。《詩童子問》引用了這一段話，但文字小有出入，另外二處出現於卷 7 ，頁 398 ： 7a ；卷 7 ，頁 406 ： 22b ，也都作「不須」。

[32] 輔廣論〈小雅・車舝〉云：「〈表記〉之言雖非詩之本旨，然讀者能如此則能有益於己矣。時過而學者，可常常涵詠此數語以自警。」同註 8 ，卷 5 ，頁 377 ： 24a 。

[33] 此類將「涵泳」、「玩味」與「興、感興、興起」連著說的在《詩童子問》中共計 13 處，見卷首，頁 275 ： 6a-6b ；卷首，頁 277 ： 11b ；卷首，頁 299 ： 54a ；卷首，頁 299 ： 55a ；卷首，頁 299 ： 55b ；卷 1 ，頁 310 ： 5a ；卷 1 ，頁 316 ： 16b ；卷 1 ，頁 322 ： 28a ；卷 3 ，頁 345 ： 14a ；卷 4 ，頁 351 ： 5b ；卷 5 ，頁 370 ： 10a ；卷 6 ，頁 394 ： 28a-28b ；卷 7 ，頁 394 ： 4b 。

[34] 同註 8 ，卷首，頁 275 ： 6a-6b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個模象，如此他裏面好處全不曾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粘，所以乾燥無汁漿，如人開溝而無水，如此讀得何益？」[35] 詩文外面的意思與裏面的意思明顯有別，而眞正的詩意就在深層，所以朱熹用骨髓來形容。朱熹又用「說不得」三字來形容這第二層的意義，表示用文字無法言傳，只能細心體味、涵泳，方能得之。[36] 對於深淺之意的判準，朱熹固未明說，但主要還是與修身有關，以〈大雅・抑〉爲例，朱熹以爲「刺厲王」與「衛武公自警」兩種說法都符合詩意，但認爲第二種說法優於前者，[37] 輔廣解釋道：

> 所謂各以一說反覆讀之者（指朱熹對〈大雅?抑〉詩旨的意見），謂以刺厲王與自警說各自求之也。訓義之顯晦疏密則先生上所言二說之得失是也，意味之厚薄淺深則以爲刺厲王者淺薄，以爲自警者深厚也。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者，蓋先生之讀詩不爲《序》所惑亂，但熟玩詩之所言而以意逆志，則詩之旨義自然可得，學者誠不可以不以此爲法也。[38]

「自警」比「刺厲王」之所以意涵更深，原因就在於「自警」和讀者的修身有

---

35 同註 8 ，卷首，頁 300 ： 57a-57b 。

36 朱熹舉〈小雅・小宛〉第五章「題彼脊令」五句爲例云：「這個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卻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卻在說不得底裏面。」同註 8 ，卷首，頁 300 ： 56a 。輔廣對此一說法頗爲欣賞，在《詩童子問》卷 5 ，頁 366 ： 3a-3b 又重錄一次。

37 《詩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熹：「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于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爲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復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疎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詩序辨說》（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本），頁 40-41 。

38 同註 8 ，卷首，頁 296 ： 49a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密切關係，且這種解釋適用的範圍比起「刺厲王」之說更爲寬廣，它沒有歷史背景、時代環境等外在因素的限制，對百代之後的讀者也有啓發作用。簡單地說，「自警」之說之所以勝過「刺厲王」就在於它開闢了一條寬廣的意義之路，它並沒有把〈大雅・抑〉這首詩的意義限制在某一個定點上，而是用很簡約、很寬泛的說法把意義開放給後來的讀者，也因此，朱熹選擇了自警說。

透過輔廣的說明，朱熹的讀詩方法大約又增加了些許說服力。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與輔廣在涵泳詩文的過程中，始終未曾跳過字義理解的這一個步驟，輔廣舉〈大學〉對〈衛風・淇奧〉的解說爲例：

> 觀〈大學傳〉，曾子所以解此詩首章後六句之說，字義明白而旨意詳備，愈讀愈有意味，此方可謂之善說《詩》。蓋後之說《詩》者詳於訓詁，則或略於旨意，泥於旨意則或遺於訓詁。惟曾子則於字義、旨意兩皆極其至也。若程伯子之未嘗章解句釋，與夫並不下一字訓詁，則又非遺其訓詁也。蓋已得其訓詁而只涵泳吟哦，使人自曉其旨意耳。[39]

可見輔廣以爲涵泳玩味經典之旨意，仍須兼重訓詁這一關，這樣才能確保其涵泳玩味所得的意義不會失之偏頗，不過這只是理論，《詩童子問》重在篇章旨意的解釋，這些旨意是如何透過訓詁所得，無法從書中看到，但筆者可以推測，輔廣對於訓詁沒有特別的企圖心，在他看來，《詩集傳》的文字訓釋是值得信賴的，既已「得其訓詁」，那就只需「涵泳吟哦」、「曉其旨意」即可。從詮釋的角度來看，可以這樣說，朱熹走的是一條曲折、迂迴的道路，先瞭解基本的訓詁意義後，再運用涵泳玩味的方法，體會全篇的大旨意涵；《詩童子問》推銷這樣的方法，當然這也表示輔廣的解釋內容，就是透過涵泳玩味得來的。

宋儒慣於以心性義理解《詩》，三百篇的闡釋內容中，處處可見闡釋者的思想觀念與學術見解。[40] 當我們說宋代《詩經》的解釋有理學化的現象時，作

---

[39] 同註 8 ，卷 2 ，頁 326 ：6b 。

[40] 詳陳戰鋒：《宋代詩經學與理學——關於《詩經》學的思想學術史考察》（西安：西北大學博士論文，張豈之先生指導， 2005 年），頁 99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呂祖謙與朱熹弟子的輔廣當然不能免。檢視輔廣那些以「理」解《詩》的言論，可以發現他多半是以評論的方式來告訴讀者，這些詩文中蘊含了哪一些的理學意味，並明白指出詩文涉及修身、成德之處。輔廣在論述詩文意旨的過程中，習慣於將理學家現成既有的名詞與觀念，套用在這些詩文上面，然後藉以說明「合天理」、「順人欲」之間的不同後果。輔廣以理學解詩，篇幅大抵短小，再加上心中對於一些理學概念已經有了定見，因此沒有對經文多作發揮。試看下列的文字，論〈衛風・蝃蝀〉：

> 男女之欲人所不能無也，要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則失其貞信之節而有害於天理之正。道即是理，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去其人欲，則能循乎天理矣。[41]

論〈王風・黍離〉：

> 久而不忘者，天理之有常也。暴集旋凐者，人欲之無定也。情得其正，則自然久而不忘矣。[42]

這類的例子在《詩童子問》中觸處皆是，例如論〈小雅・鶴鳴〉云：「鶴鳴於九皐而聲聞於野，言誠之不可揜也，所以風王之誠身也；魚潛在淵而或在於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所以風王之明善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所以風王力去其私欲之蔽也。夫必能去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43]解說〈大雅・大明〉：「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44]論〈陳風・墓門〉：「人之爲惡，初動於隱微之中，由有懼人之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人之爲惡，或有出於不自知者，則賴人

[41] 同註 8 ，卷 2 ，頁 325 ： 4b 。
[42] 同註 8 ，卷 2 ，頁 329 ： 12a 。
[43] 同註 8 ，卷 4 ，頁 359 ： 20b 。
[44] 同註 8 ，卷 6 ，頁 382 ： 4a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告教，然後得以改之。今至於歌其惡以告之，而更無所顧，則是頑然而不覺也，宜若無是心矣。」[45] 筆者發現，輔廣的論述角度大概集中在幾個理學的範疇，包括強調天理／人欲（也可以用「理／氣」、「理／欲」來表示）的分別、論修身的「誠敬」作用、論「理」、點出人情發動之初，其善惡根源的歧異等四項，再進一步統計，這四項範疇在書中分別出現十處、十一處、六處、四處。[46] 顯然以前兩項爲主，後兩項爲輔。

大致說來，輔廣繼承朱熹的理學概念，特重《詩經》對讀者的修身作用，對於天理與人欲之區別也再三致意。如果和《詩集傳》相比，則《詩童子問》的理學氣味更重，以「理」解《詩》之處超出朱《傳》甚多，[47] 但就其運用的理學意涵來說，則仍在朱學的範圍內，未有踰越之處，謹愼遵守朱熹的教誨。

---

[45] 同註 8，卷 3，頁 344：12a。

[46] 析而言之，強調天理／人欲之別的有：卷 1，〈召南・江有汜〉；卷 2，〈鄘風・鶉之奔奔〉、〈王風・黍離〉、〈鄭風・羔裘〉、〈野有蔓草〉、〈齊風・甫田〉；卷 4，〈小雅・常棣〉、〈車攻〉；卷 5，〈谷風〉；卷 6，〈大雅・皇矣〉（第五章）。論修身之「誠敬」作用的有：卷 1，〈周南・桃夭〉、〈騶虞〉、〈邶風・式微〉；卷 2，〈衛風・淇奧〉；卷 4，〈小雅・鶴鳴〉二處（第一、二章）；卷 5，〈都人士〉；卷 6，〈大雅・大明〉（第七章）；卷 7，〈抑〉（第五章）、〈烝民〉（第六章）。論「理」之說的有：卷 4，〈小雅・出車〉、〈節南山〉（第一章）；卷 6，〈大雅・文王〉二處（第六、七章）、〈大明〉（第三章）、〈皇矣〉（第七章）。點出人情發動之初，其善惡根源之歧異的有：卷 1，〈周南・騶虞〉；卷 3，〈陳風・東門之枌〉；卷 6，〈大雅・板〉；卷 7，〈抑〉（第七章）。

[47] 根據筆者的統計，《詩集傳》中以「理」解《詩》的言論大約有 27 處，而若就朱熹與輔廣二書的體例來看，《詩集傳》是針對《詩經》作全面的疏釋，以理學內涵加以解釋者僅有 27 處。《詩童子問》只針對部分的篇章作大要式的概論，以理解詩者卻高達 41 處。其中〈國風〉有 13 處，〈小雅〉有 13 處，〈大雅〉12 處，〈頌〉有 3 處。分而言之，朱子以「理」解詩的詩篇有：〈關雎〉、〈鵲巢〉、〈騶虞〉、〈日月〉、〈泉水〉、〈蝃蝀〉、〈淇奧〉、〈出其東門〉、〈鳲鳩〉、〈鹿鳴〉、〈鶴鳴〉、〈節南山〉、〈角弓〉、〈文王〉、〈文王〉、〈大明〉、〈皇矣〉二處、〈下武〉、〈板〉，〈蕩〉，〈抑〉、〈烝民〉二處、〈維天之命〉、〈烈文〉、〈駉〉。輔廣《詩童子問》以「理」解詩的篇章卷數：〈詩傳綱領〉，卷首，頁 274：5a-5b；〈周南・關雎〉，卷 1，頁 310；4a-4b；〈周南・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詩經》學史上的意義

作爲朱熹的晚期弟子，輔廣從師門處得到不少鼓勵，而朱熹也從輔廣處得到一些慰藉，[48] 在其晚年時，有七封信「答輔漢卿」，包括問其近況，這七封信最早的寫於一一九四年，最晚的作於一一九九年，是朱熹生命中的最後階段。[49] 不僅如此，《朱子語類》綜合了九十七家所記載的朱熹語錄，其中僅有輔廣所錄的曾經朱熹本人審閱，其他各家則未經朱熹過目，[50] 這些訊息顯示，

夭〉，卷 1 ，頁 311 ： 7b ；〈召南・江有汜〉，卷 1 ，頁 316 ： 16a-16b ；〈召南・騶虞〉，卷 1 ，頁 317 ： 18a ；〈邶風・柏舟〉，卷 1 ，頁 317 ： 19b ；〈邶風・式微〉，卷 1 ，頁 321 ： 26b ；〈鄘風・鶉之奔奔〉，卷 2 ，頁 325 ： 3a-3b ；〈衛風・淇奧〉，卷 2 ，頁 326 ： 6b-327 ： 7a ；〈王風・黍離〉，卷 2 ，頁 329 ： 12a ；〈鄭風・羔裘〉，卷 2 ，頁 331 ： 16b ；〈野有蔓草〉，卷 2 ，頁 333 ： 20a ；〈齊風・甫田〉，卷 2 ，頁 334 ： 22b ；〈陳風・東門之枌〉，卷 3 ，頁 343 ： 11a ；〈小雅・常棣〉，卷 4 ，頁 351 ： 5b ；〈小雅・采薇〉，卷 4 ，頁 353 ： 8b-9a ；〈小雅・出車〉，卷 4 ，頁 354 ： 10b ；〈小雅・彤弓〉，卷 4 ，頁 356 ： 15a ；〈小雅・車攻〉，卷 4 ，頁 358 ： 18b ；〈小雅・鶴鳴〉二處，卷 4 ，頁 359 ： 20b（第一、二章）；〈小雅・斯干〉，卷 4 ，頁 360 ： 23b ；〈小雅・節南山〉二處，卷 4 ，頁 361 ： 25b ； 362 ： 26b ；〈小雅・谷風〉，卷 5 ，頁 369 ： 8b ；〈小雅・都人士〉，卷 5 ，頁 379 ： 28b ；〈大雅・文王〉三處，卷 6 ，頁 381 ： 1a-1b（第一章）； 381 ： 2b（第六章）； 381 ： 2b-382 ： 3a（第七章）；〈大雅・大明〉三處，卷 6 ，頁 382 ： 4a（二處，分見第三章、第七章）； 382 ： 4b（第八章）；〈大雅・皇矣〉二處，卷 6 ，頁 386 ： 11b（第五章）； 386 ： 12a（第七章）；〈大雅・板〉，卷 6 ，頁 394 ： 28a-28b ；〈大雅・抑〉二處，卷 7 ，頁 397 ： 4b(第五章）； 397 ： 5a-5b(第七章) ；〈大雅・烝民〉三處，卷 7 ，頁 402 ： 14a(第一章) ； 402 ： 15a（第六章）； 402 ： 15a-15b（第八章）；〈周頌・維天之命〉，卷 8 ，頁 407 ： 2a 。

[48] 當朱學被打爲「僞學」而遭嚴禁時，門人多避去，輔廣獨不畏懼，居於太學之南以侍奉朱熹。朱熹欣慰，曰：「當此時立得腳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同註 1 ，卷 64 ，第 3 册，頁 2053 。

[49]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三聯書店， 2007 年 9 月），頁 530 。

[50] 同註 29 ，第 1 册，卷前，〈朱熹與朱子語類〉，頁 8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朱輔二人存在著濃厚的師生之情，後人在研判《詩童子問》的寫作動機與意義時，不宜錯過這個關節。

元人胡一中曾爲輔廣《詩童子問》作〈序〉，以爲本書撰述的動機與意旨，由書名就可推知是輔廣記錄問學於朱熹之記載。[51] 胡一中距離輔廣的年代較近，加上其意見言之成理，因此後人評介此書，多依胡一中〈詩童子問序〉之觀點。如《四庫全書總目》以爲《詩童子問》傳述朱熹的意見，爲羽翼《詩集傳》的作品。[52] 民國以後的《詩經》學史或《詩經》要籍評介的著作，大致也認爲《詩童子問》爲維護輔翼《詩集傳》所作。[53] 有學者提出稍微不同的意見，舉出《詩集傳》與《詩童子問》說解相異之處，以爲輔廣對朱熹之說有補充、申述、修正之處。[54] 但是綜觀《詩童子問》全書，實與朱熹《詩經》學同其精髓血脈，二人的觀點並未有根本性的差異之處。整體看來，《詩童子問》

---

51 元・胡一中〈詩童子問・序〉：「《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見清・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 年 12 月），第 4 册，頁 72-73 。

52 《四庫提要》：「是編大旨主於羽翼《詩集傳》，以述平日聞於朱熹之說，故曰『童子問』。」同註 19 ，第 1 册，卷 15 ，頁 343 ： 28a 。

53 戴維：「《詩童子問》是專爲輔翼朱《傳》而作的，所以輔廣就極力維護、疏通、發揮朱《傳》之能事，即朱《傳》有失誤的地方，他也曲爲之說，務求使朱《傳》合理。」《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366 。洪湛侯簡介《詩童子問》云：「持論大旨在於發明《詩集傳》，述平日聞於朱子之說。……訓解大義，以補《集傳》之未備。」《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5 月），上册，頁 383 。唐子恆：「《詩童子問》嚴守門派，專承師說。」夏傳才、董治安：《詩經要籍提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 8 月），頁 96 。

54 陳明義針對輔廣《詩童子問》與朱熹《詩集傳》進行比對，舉出 12 處差異，並認爲這表示不能說輔廣對朱熹的意見完全遵從。詳註 5 所引文，頁 84-91 。案：表面看來，輔廣對於朱熹的意見當然「沒有完全遵從」，但若仔細分析陳氏所提到的 12 處差異，其實亦可發現與朱熹《詩集傳》的說法並沒有根本上的不同，只是作局部的修正、改動而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確亦步亦趨地跟隨朱熹的意見，所差者僅是論述的程度與重心有所側重。

因此在某個角度來說，《詩童子問》的確是羽翼師說之作，過去《詩經》學史如此論斷並沒有太大差錯。但是若進一步探究《詩童子問》爲何羽翼？如何羽翼？如此羽翼究竟有何意義？這些問題目前尚未見學者有深入的論述。

輔廣《詩童子問》能在《詩經》學史上被提及，與朱熹的聲望不無關係。根據《宋史》，輔廣在當時以朱熹門人身份聞名，這點獲得時人認同。今版《朱子語類》中留存輔廣所記的語錄，其中有朱熹訓誨輔廣的記載。但是以輔廣跟隨朱熹問學時間來看，似乎很短暫。依照《宋元學案》的記載，輔廣曾經跟隨呂祖謙問學，拜入其門下，這點由朱熹與友人書信中可得到確認。約在朱熹晚年時，[55] 輔廣入臨安（今杭州）跟隨朱熹，[56] 但是爲時僅三個月就返回家鄉。也就是說輔廣先拜呂祖謙爲師，後入朱熹門下。所以，《宋元學案》提到輔廣，稱其爲呂祖謙與朱熹的共同門人。在宋代《詩經》學史上，呂祖謙與朱熹都是聲名顯赫的大學者，輔廣先後拜在兩位大師之門下，意義非凡。

呂祖謙與朱熹私交很好，但是兩人在《詩經》學史上的意見卻有根本性的差異。呂祖謙尊重《詩序》，對傳統說法維護頗力。朱熹原本與呂祖謙站在同

---

[55] 朱熹謂：「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已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答呂子約十九〉，同註 2 ，第 5 册，卷 48 ，頁 2206 。案：朱熹此信透露出兩個重要訊息。首先提到「風色愈勁」，即是朱熹之學於宋寧宗慶元四年（1198）被朝廷列爲「僞學」，一時之間門人故舊離者頗衆，此時輔廣卻前來求學。表示輔廣問學於朱熹時，已是朱熹晚年之事。又，朱熹知道輔廣爲呂祖謙的學生，並且對輔廣的人格表示贊許。

[56] 前引〈答呂子約〉有「向在臨安相聚」之語，根據陳來的考證，朱熹此書作於慶元丁巳，而輔廣甲寅從學，時朱子至臨安赴侍講之命，輔廣必在朱子入朝時於臨安從學，故後來答子約書言與漢卿向在臨安相聚。不過，陳來又云：「此書言漢卿身在都城，又恨前日相見不歡，則朱子已罷歸建陽，而漢卿仍在都下，故有此言也。」與《宋元學案》「問學於文公，留三月而後返」之說，稍有出入。詳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 376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陣營，但是中年時受到鄭樵影響，開始強烈懷疑《詩序》的可信度，[57] 認爲傳統的解釋掩沒《詩經》〈風〉詩的民歌本質，[58] 因此改寫《詩集傳》，不再盡依《詩序》之論見，甚且提出革命性的「淫詩」說。[59]

輔廣身爲呂祖謙與朱熹的弟子，當然知道兩人的見解有很大的差異。在《詩童子問》中，輔廣特別在「讀詩法」一節提到朱熹不信《詩序》的學思過程，與不贊同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的意見，進而撰寫《詩集傳》、《詩序辨說》的緣由、經過。亦即，輔廣清楚認知當時《詩經》學界「尊《序》（或「守《序》）」與「反《序》（或「廢《序》）」的學術爭端，他的業師恰好是這兩派的領袖人物。[60] 輔廣沒有走上調和兩派的路子，他堅定地站在朱熹的

---

57 朱子對《詩序》之信心之所以逐漸動搖，他自承是受到鄭樵的影響。如言：「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某自二十歲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册，其他繆戾，辨之頗詳。」以上分見《朱子語類》，第 6 册，卷 80 ，頁 2068 、 2076 、 2078 。

58 朱熹：「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以上分見《詩集傳》（臺北：中華書局， 1971 年 10 月），卷前，〈序〉，頁 2 ；《朱子文集》，卷 50 ，頁 2285 ，〈答潘恭叔六〉；卷 70 ，頁 3495 ，〈讀呂氏詩記桑中篇〉。

59 根據朱傑人的考證，朱熹最遲在淳熙丁酉（1178）開始對尊《序》的《詩集傳》進行修訂，至遲到淳熙己亥（1179），新《詩集傳》已具初稿；淳熙丙午（1186），新《詩集傳》成書，但尚未發表；淳熙丁未（1187），新《詩集傳》開始刊刻，並有可能在當年，至遲在次年（紹熙元年， 1190 ）刊成。詳朱傑人：〈朱子詩傳綱領研究〉，同註 24 ，頁 36-40 。

60 案：由於朱熹的《詩序辨說》僅反對約百條《序》說，而其晚年所修訂的《詩集傳》依然大量採用、申論《序》說，因此筆者曾表示，「朱子不是遵奉《詩序》之說，他是尊重《詩序》而不全盤接收」，詳拙著：《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2 年 1 月），頁 58 。不過，相對於呂祖謙，朱熹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陣營，積極維護朱熹的意見。在《詩童子問》中，以「先生」稱呼朱熹，以「呂伯恭」、「東萊先生」、「東萊呂氏」、「呂氏」等詞稱呼呂祖謙，其實就很能說明輔廣在《詩經》學立場上的選擇。

《詩童子問》可視爲輔廣在《詩經》學立場上的抉擇，尤其以書名來看，鮮明而謙虛地表達此書爲追隨朱熹，扣問有得的作品。但是進一步深入探究輔廣是如何「羽翼」朱熹《詩經》學意見，則可發現《詩童子問》頗具深意。

以實際治學的路徑來說，朱熹的「格物致知」說除了是涵養修德的工夫，也是一套可以落實於詮解經典的治學方法。比起純講義理的宋學家，朱熹對於經典中的文字一向能抱持較爲客觀的考索、求證態度，事實上，朱熹原本就肯定注疏的必要性，他曾說：「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61] 他反對的是繁瑣釋經、「注腳成文」的弊端，[62] 其本人對於經典的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卻不曾輕忽，他以義理爲指導，重視訓詁辨僞，就是對於缺乏依據的宋學流弊進行修正。[63] 由於朱熹重視客觀知識的獲取，因此在實際詮解的過程中，仔細地對待經典中每一字句，[64] 期望透過積累的工夫，不斷地格物，由字到詞、句、章、篇，然後掌握

屬於反《序》者，如果用「舊派」與「新派」兩名詞來作區隔，則呂朱二人特質就更清楚了。

61 引文出自朱熹《論語訓蒙口義・序》，原書未見，轉引自陳澧（1810-1882）：《東塾讀書記》（北京：三聯書店， 1998 年 6 月），頁 301 ，〈朱子書〉。

62 朱熹：「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腳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卻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卻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同註 2 ，第 8 册，卷 74 ，頁 3724-3725 。

63 蔡方鹿：《朱熹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頁 139 。

64 朱熹解經的具體作法是「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同註 2 ，第 8 册，卷 74 ，頁 3727 。有關朱熹解經重視訓詁、嚴辨名義的相關論述，可參錢穆：《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2004 年 8 月），第 4 册，頁 231-509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典文本的意涵。因此，若由《詩集傳》觀察朱熹研治《詩經》學的方法，會發現朱熹是以直觀的涵泳與客觀的訓詁雙軌並行。

但是輔廣《詩童子問》對訓詁考證幾乎略而不論，直接表述論點。事實上，有《詩集傳》在，輔廣不需在詩文意義的解釋上另起爐灶，何況輔廣原就認爲學習《詩經》不能拘泥章句訓詁，要能得其「言外之意」。[65]「言」與「意」的關係在魏晉時期是重大的學術論題，除了牽涉到語言的功能性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知識論」層次的探究。在經學研究上，對言與意的認知往往決定經典詮釋的方式。如果以爲「言」能表述一切之「意」，則所採取的策略將是專研訓詁，當「言」被徹底理解，則「意」豁然自明。如果以爲「言」無法表述完全的「意」，則「言」僅是初階理解的工具，重要的「意」需要以超越「言」的方式進行理解。一般而言，宋朝學者多承認言不能盡意，玄奧深遠的道理是「言」無法完整而眞實表述的，所爭執者僅是「意」的意涵。宋代《詩經》學史上「尊《序》」、「廢《序》」的問題之所以會引起激烈的討論，最主要的關鍵在於對傳統解釋的態度與立場，並不是在「言」的意義問題上。

「尊《序》」派中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傳統的解釋如何能成立？這個問題只要提出孔子以降的傳經源流，大致上就有神聖意義足以支撐。「反《序》」派則需強調守《序》的落伍、倒退象徵，因爲，根據歷史學家的說法，只有在創新業已難以避免，且社會也有此一需求的時候，創新才能代表「進步」。[66]亦即，「反《序》」派要面對的問題是：傳統解釋爲何不合時宜？何以漢、唐

---

[65] 如《論語・學而》子貢論「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輔廣云：「此下二節又見孔門弟子善於學詩，不泥章句，而又能得其言外之意如此。」同註 8 ，卷首，頁 275 ： 7b-276 ： 8a 。

[66] 〔英〕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J. Hobsbawm,1917-) ：「只有在創新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社會也有需要的時候——創新在此時便代表了『進步』——才會產生有系統地否定過去的問題。這時會有兩個狀況，一個是如何才能承認創新，也就是將其合法化；一個是創新之後的局勢要如何說明。」艾瑞克・霍布斯邦著，黃煜文譯：《論歷史》（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2 年 8 月），頁 45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師認同、相傳的解釋，到了宋代就必須被質疑或推翻？自北宋以來，「反《序》」派學者對此一問題，回答地較爲含混，大致上以「據詩尋義」、「直覺體會」的主觀推論來說明新解的來源。輔廣面對呂祖謙與朱熹的不同說解方向，選擇朱熹反傳統解釋的立場，勢必要提出解釋，告訴大家，傳統解釋的價值何以必須大幅壓低？

輔廣《詩童子問》並未深入處理訓詁釋義的問題，除《詩序》外，也絕少提到漢、唐故訓，宋代學者的義理闡發倒是頗有引述。這種論述傾向主要是源於對《詩經》的義理型態認知，以爲眞實而美善之義理超脫文字以外而存在。《詩童子問》認爲「言外之意」才是詩義所在，並謂朱熹解釋高出前人之處即在於此。[67] 因此，《詩童子問》解釋時特重語言以外的意義，並且認爲這種意義無窮無盡，不是語言所能盡表。[68]

輔廣以爲「言外之意」來自於心之所發，[69] 所以由「心」出發，探究《詩經》意義，才是理解聖人深意的最好方法。有此想法，故《詩童子問》提出「涵泳」、「玩味」的方法，對經文進行閱讀與理解。

「涵泳」、「玩味」出現在許多宋代的解經著作中，似乎是當時流行的共通語。使用此一方法詮釋古典，主要是以主觀的體會進行理解活動，智識在此過程中僅處於工具性質，情意才是活動的主軸。[70] 宋儒大致上認識到情意型態

---

67 輔廣論〈周南・關雎〉，以爲朱熹的解釋「深得詩人言外之意，先儒皆所未及也」，又以爲朱熹解釋〈卷耳〉，「說后妃貞靜專一之意，可見於言外。」以上分見《詩童子問》，卷 1，頁 310 ：4a 、311 ：6a 。

68 《詩童子問》說〈召南・采蘩〉：「其敬事之意自見於言外。」卷 1，頁 314 ：12a ；說〈小雅・天保〉：「夫人心自以爲足則已矣，故〈天保〉之臣祝其君以福祿，言有盡而意無盡也。」卷 4，頁 353 ：8a 。

69 《詩童子問》論〈秦風・渭陽〉：「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心之發固如是也。」卷 3，頁 342 ：9b 。

70 案：關於體驗，西方的詮釋學也有這類的見解，先是德國的施萊爾馬赫(F.E.D.Schleiermacher ， 1768-1834) 擴大了詮釋學的領域，包括所有的流傳下來的文本和精神作品，而不只是那些權威性或神聖性的古典著作。「由於這種擴大，詮釋學失去了它在傳統上視文本爲眞理傳達的關係，代替這種傳達眞理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理解是一種連續性的動態活動，因此在理解過程中，一時出現的意義並不具穩定性與系統性，所以需要時間的積累以檢視、貞定獲取的意義。學者在論讀書方法時常常將涵泳、玩味與熟讀連在一起說，即是希望藉由長期的、持續的閱讀以保證意義的穩定。

自董仲舒 (179-104B.C.) 提出「《詩》無達詁」的命題以來，[71]《詩經》意義多元化的合理性與操作的可能性成爲一項論題。不過，意義多元化的現象雖然存在於先秦時代，但是受限於《詩經》漢學傳統解釋的權威，自魏晉至隋唐，多元化的意義並無法眞正展開。北宋歐陽修 (1007-1072) 提出《詩經》意義產生的對象性問題，表達《詩經》意義多元化的實質存在與其合理性。[72] 只是，宋代學者普遍對於意義多元化不表興趣，多數還是努力追尋一個穩定的意義，一種簡捷易達的道理。歐陽修的意見對他們而言，只是提供衝破傳統舊說

關係，文本被認爲是作者的思想，生活的表現和歷史時期的表現，因而理解等同於重新體驗和再次認識文本所自產生的意識，生活和歷史時期。」詳洪漢鼎：《詮釋學史》（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2002 年 6 月），頁 317 。另一德國的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1833-1911) 以爲，精神科學的眞正認識論之基礎是體驗，是由生命的整體內在對社會和歷史眞實性的體驗。理解就是通過對體驗的再現而認識和把握生命，因爲人類具有「同類性」，可以通過再現相同的情感、意志、目標、價值取向的過程而再進行體驗，進而達到理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狄爾泰斷言，因爲我們能夠再體驗，所以我們能理解。詳謝地坤：〈狄爾泰與現代解釋學〉，《哲學動態》， 2006 年第 3 期，頁 21 。

[71]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案：「達詁」、「達占」、「達辭」之語有異詞。「占」字，蘇輿 (1873-1914) 云：「天啓本作『言』，《玉海》四十引作『吉』。」蘇輿又引凌曙 (1775-1829)：「《詩・汎厤樞》作『《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說苑・奉使篇》引《傳》曰作『《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困學紀聞》引作『《易》無達吉，《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 1992 年 12 月），卷 3 ，頁 95 。

[72] 歐陽修認爲《詩》義有四重：詩人之意，聖人之志、經師之業、太師之職。詳《詩本義》，《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經部，第 64 册，卷 14 ，〈本末論〉，頁 290 ： 7a-291 ： 8a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啓示，眞正依循歐陽修理論進行理解《詩經》的著作，相當稀少。

「涵泳」、「玩味」的方式建築在以心證心，以心體心的理論基礎上，也是基於「理一分殊」的理學觀點上。但是其所探求的不是意義的多元，而是唯一的眞理。可以預見的是，在不同的讀者各自以其情意進行理解的過程中，意義的多元現象無可避免的將會浮出。即便讀者自認業已獲取穩定的詩義，那也是屬於個體生命經驗體會所得之意義，並不具備理解與解釋上之普遍性。當然，就個體而言，這樣的操作所得的結果，無疑具有生命意義上的合理性，詮釋的任務可謂已然達成，這也是宋代許多學者勇於反對傳統舊說的原因。

《詩經》學到了宋代，詮釋的權限被擴大，漢學的權威性與神聖性遭到嚴厲的質疑與挑戰。在「新派」儒者看來，理解三百篇等同於重新體驗和再次認識《詩經》文本所自產生的思想意識與生活型態，其中，影響力最大的就是朱熹。朱熹雖然知道訓詁是解經的必要步驟，但其《詩經》學鮮明地反對舊說，並且提出震撼學界的「淫詩」說，所使用的方法與理據不是訓詁考據，更非名物辨證，而是通過涵泳玩味之後的體悟而來，這是朱熹《詩經》學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方法。輔廣對此方法深有所得，並且於《詩童子問》屢屢強調，目的就是揭示朱熹解釋《詩經》學上的方法論問題。

由《詩童子問》卷首的「詩傳綱領」、「小序」、「師友粹言」，更可看出輔廣對於宣揚朱熹《詩經》學方法論的用心。《詩童子問》「詩傳綱領」部分引錄朱熹《詩傳綱領》所選的文本，輔廣對這些文本進行論述。《詩傳綱領》所選的文本主要是歷來重要典籍、學者關於閱讀《詩經》觀點的重要言論，輔廣於下所注多集中在閱讀方法與觀點的敘述上。「小序」部分則是仿《詩序辨說》體例，更正《詩序》，提出新解。「師友粹言」則首列「讀詩法」，將朱熹關於讀《詩》的重要言論摘錄下來。

朱熹《詩經》學主要著作是《詩集傳》、《詩序辨說》、《詩傳綱領》，這三部書分別代表經典詮釋、反《序》要旨與閱讀觀點的寫作趨向。輔廣的《詩童子問》、《詩童子問・小序》與《詩童子問・詩傳綱領》之寫作意旨與朱熹三本著作相當，依循朱熹《詩經》學體系撰作的意圖極爲明顯。《詩童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問》多處引述朱熹三本《詩經》學著作，因此《詩童子問》可視爲朱熹《詩經》學體系建構完畢之後的補充著作。

歷來對《詩童子問》之意義描述，多以爲是「羽翼」朱熹《詩集傳》的作品。其實，較爲完整的說法應該是爲補充、強化朱熹《詩經》學體系的作品。何以不稱「羽翼」？因爲朱熹《詩集傳》、《詩序辨說》、《詩傳綱領》三本書在方法論問題上提得較少，今日研究朱熹《詩經》成績者，要瞭解其研究方法，必須通過《朱子語類》才能有深入而完整的認識。但是，今本《朱子語類》的成書相當晚。[73] 輔廣當時之學者若要瞭解朱熹《詩經》學，只能依據《詩集傳》、《詩序辨說》與《詩傳綱領》，這些文本在論《詩》意旨與解《詩》觀點方面已有相當明確的論述，唯獨在方法論的敘述上有所欠缺。因此，輔廣《詩童子問》特意補充論述其在追隨朱熹時，所領受關於《詩經》學的研究方法。閱讀《詩童子問》，會發現在朱熹飽受爭議的論點之處，輔廣所表現的態度不是激烈地批駁對立觀點，或是論證詳密地捍衛師說，他只是淡淡地表示朱熹的意見是正確的，更多的篇幅用在表達涵泳玩味讀《詩》的重要性與操作歷程。

就《詩童子問》書名與內容來看，所問者即是讀《詩》方法。所以，就《詩經》學史的意義來看，輔廣《詩童子問》爲親受朱熹教誨之後，對朱熹《詩經》學體系方法論上的補強論述。因此，就著書意旨與學術傳承的歷史性觀之，輔廣《詩童子問》當可作爲研究朱熹《詩經》學的研究材料之一，它的重要性不是後來所謂「羽翼朱學」的作品所能比得上的。另一個深遠的意義在於，《詩童子問》是宋代《詩經》學史上，較爲完整表達《詩經》宋學方法的專著，這個方法的開展起於北宋，至南宋朱熹取得突破性的成就，而輔廣忠實地、貼心地將此一方法較爲詳盡地、具體地表述出來。

---

[73] 朱熹於 1200 年過世，第一部池州刊《朱子語錄》於寧宗嘉定八年（1215）出版，黃榦對其內容甚不滿意；今本《朱子語類》則是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黎靖德編輯出版的。詳《朱子語類》，第 1 册，卷前，「點校說明」，頁 7-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結　　語

不少宋儒普遍存在一個觀念，《詩經》的意義理解，不需從漢唐以來的詮釋文本出發來把握，朱熹的想法並未如此極端，在他對《詩序》不再充分信任之後，解詩依然能適度尊重《詩序》之說。[74] 這是因爲朱熹雖然力倡知識擴充，但其追求知識只有在「尊德性」的結構中進行才有意義，[75] 而《詩序》的詮釋內容正是從倫理教化的角度啓程，其所標榜的美刺精神與比興傳統的確立，更是對後代詩歌創作和批評有正面的作用，故傳統《詩經》學仍須肯定並予以尊重。

作爲朱熹的晚期得意弟子，輔廣放棄了原先拜在呂祖謙門下所建立的《詩經》學概念，以《詩童子問》強化了朱熹《詩經》學中的方法論，由於本書不錄詩文與《詩序》，連朱熹的解題文字也未收錄進來，所以《詩童子問》無法成爲一般的《詩經》讀本，需與《詩集傳》一併閱讀方能見出其意義。

元人胡一中在偶然的機會中獲得一將輔廣《詩童子問》與朱熹《詩集傳》合訂爲一集之作，胡氏爲此書作〈序〉，稱輔廣《詩童子問》爲羽翼朱《傳》之書。[76] 朱熹師生二書的合訂之舉很有意義，一來《詩集傳》的讀者可以透過《詩童子問》以瞭解朱子的讀《詩》法，二來《詩童子問》的讀者可以快速查閱輔廣所稱的「先生曰」之詳細內容，三來這表明所謂的「羽翼」不是「辯護」，而是一種「補述」，一種「發揚」。後來朱熹之學在元明兩代因有朝廷

---

74 同註 60 ，頁 56-58 、 181 。

75 余英時：《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08 年 6 月），頁 240 。

76 胡一中：「曩於構李聞士夫藏是書如至寶，傳是書如秘術，殊有負著述之本意。今閱建陽書市，至余君志安勤有堂，昉得是書而鋟諸梓，且載文公《傳》於上，而附《童子問》於下，粲然明白……。」〈詩童子問序〉，同註 51 ，第 4 冊，頁 73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推動，[77] 而取得崇高的地位。輔廣《詩童子問》被視爲「羽翼」朱學中的一支，彷彿是續貂食羹之作。[78] 但是，就《詩童子問》成書的歷史條件與撰作方

---

77 清・皮錫瑞（1850-1908）：「元仁宗延祐定科舉法，《易》用朱子《本義》，《書》用蔡沈《集傳》，《詩》用朱子《集傳》，《春秋》用胡安國《傳》，惟《禮記》猶用鄭《注》，是則可謂小統一矣。」《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 年 11 月），頁 308。《明史・選舉志》：「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後頒科舉定式，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註疏不用。其後，《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禮記》止用陳澔《集說》。」《明史》，《正史全文標校讀本》（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 12 月），第 1 册，卷 70，頁 455。吳雁南等：「永樂十二年（1414 年）十一月，明成祖詔諭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詩經大全》二十卷，乃以元人劉瑾《詩傳通釋》爲本而稍加潤益，小變其例而已。劉氏之書因專爲朱《傳》而作，故對朱《傳》之矛盾抵誤者，多委曲遷就，一一迴護。」吳雁南、秦學頎、李禹階主編：《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433-435。

78 《宋元學案》：「先生（案：指輔廣）生於軍中，以父恩授保義郎，轉忠訓郎，漕舉四試不第，始從呂成公遊。已問學於朱文公，留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言其用志堅苦也。」「百家謹案：輔潛庵一儒生耳，漕試四舉不第，陳秋塘送之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其衰颯一至此也。」〈朝奉輔傳貽先生廣〉，同註 1，第 3 册，卷 64，〈潛庵學案〉，頁 2053-2054。《四庫提要》：「張端義《貴耳集》載陳善送廣往考亭詩曰：『見說平生輔漢卿，武彝山下喫殘羹。』似頗病其暖暖姝姝，奉一先生；然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謹守師傳，公門別戶，南宋以後，亦不僅廣一人，不足深異。」同註 19，第 1 册，卷 15，頁 343：28b-344：29a。兩書對輔廣「武夷山下啜殘羹」的解讀不同，假若《提要》的理解是張端義原意，則「啜殘羹」之譏有可能讓後世讀者以爲《詩童子問》與其他所謂守《朱》派著作無異，此則可謂不明輔書的書寫用意。《經義考》引王禕曰：「輔氏《童子問》，其說多補朱氏之未備。」此言斯爲得之。同註 51，第 4 册，頁 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向來看，只要朱熹《詩經》學的成績受到肯定，《詩童子問》在《詩經》學史上就該獲得足夠的重視。

（責任校對：陳建男）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宋・歐陽修：《詩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四庫全書》本。

宋・蘇　轍：《詩集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四庫全書》本。

宋・朱　熹：《詩集傳》，臺北：中華書局，1971 年 10 月。

宋・朱　熹：《詩序辨說》，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本。

宋・朱　熹：《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 2 月。

宋・輔　廣：《詩童子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四庫全書》本。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年 1 月。

元・袁　桷：《清容居士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本。

元・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正史全文標校讀本》本。

明・程敏政編：《皇明文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本。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12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朱彝尊著，游均晶等點校：《經義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 年12 月。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正史全文標校讀本》本。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10 月。
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8 月。
清・陳　澧：《東塾讀書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6 月。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 年11 月。
清・蘇　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12 月。

二、近人論著

朱傑人：〈朱子詩傳綱領研究〉，收於鍾彩鈞主編：《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 年6 月。
余英時：《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 年6 月。
吳雁南、秦學頎、李禹階主編：《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9 月。
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5 月。
洪漢鼎：《詮釋學史》，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 年6 月。
夏傳才、董治安：《詩經要籍提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8 月。
陳　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三聯書店，2007 年9 月。
陳戰鋒：《宋代詩經學與理學——關於《詩經》學的思想學術史考察》，西安：西北大學博士論文，張豈之先生指導，2005 年。
陳明義：〈輔廣《詩童子問》初探〉，《修平人文社會學報》第7 期，2006 年9 月。
黃忠愼：《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文化事業公司，2002 年1 月。
蔡方鹿：《朱熹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 年10 月。
謝地坤：〈狄爾泰與現代解釋學〉，《哲學動態》，2006 年第3 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錢　穆：《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2004 年8 月。

戴　維：《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9 月。

〔美〕孔恩著，程樹德、傅大爲、王道還、錢永祥譯：《革命科學的結構》，臺北：遠流出版社，2004 年8 月。

〔英〕艾瑞克・霍布斯邦著，黃煜文譯：《論歷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8 月。

桐鄉新聞網：http://txnews.zjol.com.cn/txnews/system/2006/09/01/000001649.shtm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